

陆士清 主编

台湾小说选讲新编

· 复旦大学出版社 ·

沪新登字202号

责任编辑 杜荣根

台湾小说选讲新编

陆士清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国权路 579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复旦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8.25 字数 477,000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7-309-00558-9/I·39

定价: 8.30元

近期台湾短篇小说主题意识寻迹

——序《台湾小说选讲新编》

· 陆士清 ·

70年代以来的台湾文学，是在错综复杂的社会思潮刺激下曲折发展的，短篇小说创作也不例外。

70年代初，台湾短篇小说创作走进了低谷。到70和80年代相交之际，由于一系列政治震荡、经济持续增长，文化领域中对现代诗的批评和乡土文学的论战等的影响，原来一些眼观“世界”，心存西方，怀着外来文化沙文主义的心态，宁愿将自己的艺术，架空建构别种文化上，而不愿认可台湾本土的问题为问题的作家，开始“从一套西方的××主义、文化下走出来……”^①短篇小说创作萎缩的现象有所改变，而且形成了关怀现实、拥抱乡土，多元发展的态势。剖析一下这时期短篇小说的主题意识，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

由于经济持续增长，7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机器怪手举起的铁拳，正摧枯拉朽地铲除旧日文明伤痕

迹；昔日的良田一夕之间废弃了阡陌，改种一种钢筋水泥的高价值方形作物；公司企业的巨轮转动，成为一切心灵作息的根本依据；声光文字的各色传播媒体，排山倒海似的将无数驳杂的讯息，倾注入没有抗拒能力的个体，并改洗了他们的大脑。与这外在景观变化相并行的是，台湾经济的国际化、自由化、制度化。正因为此，国际资本凭着他们技术先进、资金强大等优势，日益渗进台湾社会，使台湾经济、文化和人的意识越来越向殖民化倾斜，70年代所发生的乡土文学论战，实际上是在这样的经济和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背景上发生的。乡土文学论战以后，这种倾斜，更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并且在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反映，陈映真的《华盛顿大楼·第一部：云》，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华盛顿大楼》是一部中短篇系列小说，由《夜行货车》、《上班族的一日》、《云》、《万商帝君》等四篇作品组成（1983年出版）。这里被题为书名的华盛顿大楼，是西方跨国公司（包括四篇小说所写到的跨国公司）在台北的办公大楼。它是国际资本的象征。这四篇小说写的就是国际资本企业行为下的人。

《夜行货车》的故事发生在马拉穆电子公司。公司财务经理林荣平从女秘书刘小玲那里寻找感情寄托，但不愿因刘小玲而离婚重组家庭。他挑逗洋老板，使刘小玲受到了洋老板摩根索的调戏。当刘小玲要求他去与洋老板论理时，他也只感到“一股暧昧的怒气”。他像家奴一样，替老板做假账，欺骗上属公司的检查。及至最后，在洋老板摩根索当众侮辱中国人，别人起而抗议时，他仍然是奴相十足。因为他想到的不是做中国人的尊严，而是名誉、地位。公司给予的“玫瑰色的天地”，销蚀了他的民族意识，销蚀了他的基本的人格尊严，甚至连原始的雄性的妒嫉的勇气也荡然无存了。

如果说林荣平是为了确保他的既得的“玫瑰园”，那末，《上班族的一日》中的黄静雄则还在为取得这种“玫瑰园”而拚

搏挣扎。黄静雄在莫理逊公司，从一个挤公共汽车的小职员升任了可以车代步的报表组主任，成了野心勃勃的经理的心腹，并为经理做假账、做黑账，一心想坐上正空着的副经理的位置。他不是不知道洋公司里有着“既深又广的腐败”，在争当副经理受挫时也曾想辞职，但是他立刻感到自己“其实早已落在重重的生活的、驱使每一个人去上班、下班的无形的巨大的网罟之中，难以动弹”了。他丧失自己的理想和意志。当从电话里得知他的朋友都在“忙”，忙于做大笔生意的广告，忙于改变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消费习惯，以便把美国的产品推销出去时，他忽然感到仿佛被整个世界所抛弃了的孤独。资本已经把整个世界绵密地组织到一个无从理解的巨大的、强力的机械里去。他也不得到这架机器中去寻找一个小小的位置。他不会觉得这有什么意义，然而他无法摆脱！

应该说，在这架大机械中的追逐滚转，黄静雄还有些犹豫，而《万商帝君》中的“上班族”就不可同日而语了。《万商帝君》是陈映真存义极高、内涵甚为丰富的一部作品。在这篇作品中可以看到当时台湾“执政党”和“党外”面目的共性，也可以看到“革新保台”思想的孳生，但作品的侧重点仍然是通过对跨国公司商品行销方式的描写，给现代工业资本主义推行的经济和文化殖民以曝光。坚船利炮政策的时代过去了，现在是以甜美的商品向第三世界进军。美国莫飞穆公司总裁布契曼向属下说的一席话是耐人寻味的：“我们卖的不只是各种产品，更重要的，我们卖的是一种观念，一种文化。进步的、合理的、舒适的、享受人生的理念和文化”要“把世界当做我们经营管理的地理范围；把海洋当做湖泊；把各别的陆洲当作市内的分区；把各民族人民当作零售顾客；把各世界大公司当做我们的中盘和零售商”。“每一个台湾莫飞穆公司的管理干部，从现在开始，应该成为一个世界的管理者”。可悲的是，布契曼的话不仅没有引起反感，反而使

得他的那些管理者异常的兴奋，甚至陶醉。他们有的想当国际经理不成而精神分裂，如林德旺；有的以空前的热情，为公司制订行销计划，要以商品来征服同胞征服世界。公司行销经理刘金福决心开发“同胞对商品的欲望”，业务经理陈家齐宣称要以跨国企业商品在品质上的统一性，创造“一个没有文化、民族、政治、信仰、传统的差别性的、统一的市场”他们的目的，不只是金钱和地位的获得，而是对工作成就——从台湾伸向以全球为舞台的工作成就的追求。他们自己觉得已从传统和家庭而来的民族国家信念逐渐解放了出来，已经是在讲英语，过着奢华生活，为莫飞穆国际公司全球性的利益——而分析、研究、学习、工作。他们自称已经“从台湾人成为国际人”，已“属于一个新的、聪明的、精英的、创造世界更好、更丰盛生活的民族和人种”。总之，国际资本丰厚的供养和提供他们表演的舞台使他们沉醉，而没有想到，充其量他们不过是被加足了油，为国际资本攫取利润的机器，是实施经济和文化殖民的工具而已。他们是新时代的洋买办。从一个正常的人变成一个精神分裂的人；从在台湾的中国人，变成所谓“国际人”，所谓的新的“民族和种族”，这是新时代国际资本凭着先进的科技、强大的资金、甜美的商品和各种手段使人异化的结果。这种异化过程，从本质上说，就是殖民化的过程。陈映真在这些作品中揭示这种异化，实际上是对新时代的殖民化的批判。

更可贵的是，在这些作品中，陈映真还描写了具有民族尊严，起而抗争的知识分子形象。如《夜行货车》中的詹奕宏、刘小玲，《云》中的张维杰。《夜行货车》中的詹奕宏，精明能干，颇受老板赏识，如果他作跟林荣平同样的选择，当然可以干得很好，但是他汉魂终不灭，尊严不可辱，为了做一个挺直脊梁的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辞职抗议老板的侮辱，而与刘小玲回归了民族的乡土。《云》中的男主人公张维杰同样如此。美国麦迪

逊仪器公司的总经理艾森斯坦，打着所谓“员工的人权，企业民主”的旗帜，要他属下张维杰经理到下属工厂重组工会，并宣称：“一个真正属于工人的工会，对公司和职工都有益处”。张维杰遵其所嘱，深入到工人中间组织发动，工人积极分子也热烈响应；但这种重建工会的行动，却触犯了台方老板的利益，他们及其附庸工会则竭力阻挠和破坏。在投票选举的关键时刻，艾森斯坦在台方老板和上司的压力下，出卖了工人。选举未成，工人们作出了很大的牺牲。满怀欠疚的张维杰愤然辞职离开了公司。尽管父母对他去辞不能理解，但他矢志不移。在以后的为生活的打拼中，他还为自己对工友们的淡忘而悔恨。在金钱、地位和所谓的成就感与真理、正义和理想之间，张维杰选择了后者。

詹奕宏、张维杰他们身上，蕴含着健全的民族意识以及对劳动者的关怀，寄托着陈映真的理想和希望。而林荣平、陈家齐、刘福金以及想当国际经理而不得的林德旺，则是被国际资本异化了的人。如前所说透过他们，陈映真对现行经济体制提出了批判。陈映真在指出乡土文学论战的局限性时曾说过：由于当时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论战没有向纵深发展，“没有全面发展成对战后台湾的体制，以至对‘冷战’这个概念，提出清算、批判、跟反省。”^②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话，《华盛顿大楼》系列的创作，实际上是陈映真对乡土文学论战局限的一种弥补和补充，也正因为这样，此一系列小说才真正具有了鲜明的时代性和真正的思想深度。

当然，陈映真看到了问题，但是出路何在呢？他开不出药方（也许这不是作家的任务）。他曾说过：这个问题，已“成为一切关心人类的思想家和文艺工作者的艰深的课题”，“所以艰深，是因为没有了清晰的答案之故。”^③因此，陈映真笔下的詹奕宏或是张维杰，他们的抗争，都涂抹上了“悲壮”的色彩。陈映真在探索，但不知道路在哪儿。在一个新的体系遭到曲折的

年代，生活在台湾的陈映真，有点儿迷茫大概是不足为怪的吧？！可贵的是，他仍秉笔批判，在坚持自己的理想中前行！

二

进入80年代，由于台湾社会的高度工商业化和商品的大量生产，大众生活日益富裕。大众消费能力的提高和公司企业营销活动对消费欲望的开发，催生了消费人的登场和大众消费社会的形成。而人的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革命”：快乐、享受和对幸福的追求，已被当作一种公开的正当的目的。金钱成了判别价值的标准，财富即等于成功。诚实的工作者不再被父母引为儿女教育的典范，替代的是那些能以机巧聪明迅速取得财富的投机者。出轨的少女，流离在大都会的暗角，她失去了旧日伦理所紧守的价值，却自以为赚到了新社会的源泉……台湾社会如此巨大的变动，以及它在变动中提出的诸种问题，为小说家们提供了源泉。虽然，他们还未能以长篇巨制来描绘这种“创世纪”，但他们的短篇小说则在一定程度上记录和摄下了这个社会轮子滚动的影迹。廖蔚夫的《隔壁亲家》、《竹子花开》、黄凡的《人人需要秦德夫》、萧飒的《小叶》等作品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们集中描写价值观念的挫动及其阵痛。分析一下他们的作品也许更能说明问题。

转型期的台湾社会存在着两种价值系统，即正在逐渐减退的传统价值观念和正在上升的摩登价值观。在实际生活中这两种价值系统必然会发生磨擦，并且在磨擦中此消彼长。《隔壁亲家》通过石龙伯和粗皮雄仔两个农家的兴落的对比，描写了这种价值的冲突，揭示了摩登的工商社会的功利价值观向传统价值观挑战并将取代它的趋势。石龙伯和粗皮雄仔是紧邻密友，两家指腹为婚，亲家往还。但在社会商业化的震荡下，这对朋友却成了怒目

相向的“仇人”。原先，石龙伯各方面都比粗皮雄仔强。石龙伯有水田一甲，粗皮雄仔只有旱田三分。石龙伯栽秧割稻，粗皮雄仔只能种蕃薯度日。石龙伯生了三个儿子，粗皮雄仔却生了三个女儿。“生子得龙，生女得虫”，两相对比，似乎粗皮雄仔注定要衰落的。然而风水倒转，因城市延伸，房地产涨价，粗皮雄仔的旱地卖了大钱，率先造了楼房，而阿龙伯的水田禁建，谷价又低，盖楼房渺茫无期。阿龙伯的儿子或在家种地，或当拉客黄牛赚钱有限，小儿子在大学读中文系，连注册费也付不起。粗皮雄仔的二女儿从观光饭店员工做到应召女郎，赚了大把钞票，最后与美国黑人结婚，挖到了“黑金矿”。小女儿商职毕业一个月赚的钱比阿龙伯大儿子全年收入还多。最令人丧气的是，读大学的儿子追求其小女儿还遭到了拒绝。阿龙伯后悔没有生个女儿，他的有田有子勤劳生财的观念似乎正在动摇了，他的自信和自豪在时代的震荡中抖落了。阿龙伯是痛苦的，但他却无奈。《竹子花开》比《隔壁亲家》早一年发表，写的是临近破产农民跛脚松的悲喜剧。跛脚松种田度日，一年不如一年，只好将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可是儿子不争气，女儿去台北就业后被她的总经理搞大了肚皮，在竹子花开的时候，《倒楣的时刻》回到了家。先前色情贩子想将其女儿贩到台北当妓女，他为捍卫自己和家族的尊严而痛骂色情贩子，如今遭到了色情贩子的当面羞辱。他痛苦得有生不如死的感觉。但是天无绝人之路，突然总经理要来探望他的女儿，拜见他这位岳父大人，并将赔偿“精神损失”。跛脚松心里顿觉宽慰，并盘算着如何敲总经理一笔。对此他虽觉得可卑，但仍为迎接总经理而修葺自己的茅屋。从跛脚松因为女儿而欣慰、痛苦转而宽慰的故事中，似乎依稀可以看到台湾农村对城市的依附，希望发展中的城市能在经济上拉农村一把，然而，也正是这种经济杠杆作用，使得像跛脚松这样的农民的道德、价值观念开始动摇和崩溃，最后淹没在工商社会的功利主义之中。

我们还可以看看履疆的《杨桃树》。如果说上述作品价值磨擦发生在农民身上，那末，《杨桃树》描写的道德价值磨擦则发生在一对“都市”夫妇之间。《杨桃树》的情节很单纯：主人公昌平与淑惠夫妇，带着两个小孩从台北回昌平的老家褒忠（云林县的一个小乡村）度假。昌平有一个星期的慰劳假，想藉此尽情享受对故乡的甜美的回忆，但淑惠则在当晚就宣布，翌晨即回台北。昌平不悦，他的两老也深感遗憾。昌平是农家子弟，为追求高生活水准来到城市，但忘不了农村对他的滋养。昌平要多住些日子，因为褒忠才是他的家，台北不过是驿站。淑惠不同，她出生在城市，她和昌平共筑的家在台北，她对褒忠没有归属感。台北才是她的根，所以她急着归去。昌平爱杨桃，爬上家里的杨桃树摘桃子，西装裤子被撕裂成了高叉旗袍，他和两老哈哈大笑，乐不可支。可淑惠的反应则是：“白了他一眼，这套夏天西装可是花了几千块钱做的，他竟这般不知爱惜。”随后又是“涨红着脸，心里咒骂，恨得要命，又听到婆婆公公快乐的笑声，隐不住厌恶、恼怒”。昌平与淑惠没有争吵，而只有在处事差异中表现出来的、隐而可见的内心冲突，小说就是抓住这些差异和内心冲突，描写了昌平这个农家出身的城市人与被金钱价值观念熏陶出来的淑惠的价值磨擦。黄凡的《人人需要秦德夫》，描写的是台湾商业社会里一位成功者与一位失败者的对比。成功的是商人秦德夫。失败的是秦德夫的同学何律师。秦德夫自小家境贫困，但他好胜、自信，在商界白手起家，成为台北少数几个真正有实力的巨富。他拥有黑色奔驰汽车、守卫、大花园、网球场，动辄百万的捐款。他有一位法学博士与两位经济学博士为他处理伤脑筋的税务问题。他精力充沛、富有企业家的精神，也富有侵略性、能为达到目的而牺牲一切。无论在体力上和精力上都是文明社会中的“野兽”。他几乎违背所有的传统道德与法律的规范。他有了老婆还要情妇，经营非法行业，还要竭力逃税，而且

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对，是理所当然的。他成功了。尽管他老了，但仍有一股吸力，能将年轻漂亮的情妇抓住，甚至在临动脑手术前，还说要情妇给他生一个儿子。他在手术中死去了，葬礼隆重而热闹，台北有头有脸的人都到了，记者更是蜂涌而上。一位部长先生迎着闪烁不停的镁光灯讲话：“人人需要秦德夫这样的慈善家，实业家，他的逝去是大家的不幸，社会的不幸”。与秦德夫相对比的何律师，曾有过辉煌的日子，开过声誉卓越的律师事务所，但后来他落伍了，他多愁善感，怀疑自己老了，以至于失去魅力，与他同居的漂亮的情人也弃他而去。从此他精神恍惚，百无聊赖，变得谁也不需要了。成功者人人需要，失败者弃如敝屣，在秦德夫与何律师对比中，揭示了竞争社会残酷的公共价值原则。传统价值观念在崩塌，新的时髦的价值观念正在荡涤它的最后的痕迹。社会笼罩在资本主义功利之中，这里表现得是再清楚不过了。

在资本主义的台湾，成功意味着获取金钱和财富，人们把获取金钱当作追求的目标。有的年轻人甚至认为“有钱才是生活”，萧飒的《小叶》描写的就是这样的青年。小叶是个女孩，母亲改嫁，她被继父污辱，此后就像一张叶子飘落在台北的黑暗的角落。在不经意的情况下，与观光酒店的侍者刘智原同居，以肉体换来的钱供养他。他们是都市社会的失败者，谈不上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认同，然而，他们被这种价值观腐蚀了，自觉不自觉地认为“有了钱，世界上一切都那么美好。跳舞、上馆子、购物、消夜……这才是生活。”他们价值虚无，理智空白，缺乏任何足以作为下一步参考的生活目标。

烟囱林立、大厦耸天、商业繁荣、生活富裕，固然是社会变化的明证，但它毕竟是表征。只有人的变化，特别是人的价值观念的变化，才是社会变革的深层律动。这时期台湾小说创作，描写了台湾社会各阶层人物价值观念的挫动，为现代台湾留下了一

份生动的“社会档案”，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风貌和深刻的思想意义。

三

女性小说的繁荣和女性意识的觉醒，是这时期台湾小说创作乃至整个台湾文学的一大特点。40多年来的台湾女性文学有其传统。早在50年代和60年代，台湾就出现了一批女作家。林海音、聂华苓、於梨华、陈若曦、欧阳子、丛甦、张晓风等，她们的许多作品描写妇女的生活遭遇，记录妇女的心声。如林海音，探索妇女的命运，可以说是她作品的基本主题。7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形成的综合影响，又一批女作家登上了台湾文坛，施叔青（她现在长居香港）、李昂、曾心仪、萧飒、袁琼琼、萧丽红、蒋晓云、廖辉英、吕秀莲、朱秀娟、三毛等等。她们开拓了女性文学的空间，呼唤女性意识的觉醒，为台湾女性文学带来了进一步的繁荣。

所谓女性文学，也即是女作家写的以女性生活为题材，关心女性命运的文学，女性小说亦然。袁琼琼、萧飒、蒋晓云、曾心仪等都可以说是女性小说家。袁琼琼写得比较多的是妇女的恋爱婚姻的所谓“两个人的事”，《春水船》、《微云》、《流水年华》等作品描写妇女爱而不能得的痛苦。在这些作品中，我们会常常看到那种像绕树藤似的依附于男性的形象。《茶廬花开的下午》里的碧淑明知同居者十分自私、任性、寡情，她意欲离开他，但又觉得自己不能不爱他，只有爱才能留住他，“她是向日葵，他是她的太阳”。她缺乏自信，没有把握。只有男人才是她存在价值的肯定。这种情况也表现在《小青与宋祥》中。小青与宋祥同居但不结婚，因为她觉得女人都让婚姻毁了，她对女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一点信心都没有。她似乎强烈排斥男性，但有

时又觉得“有个人靠靠也蛮舒服的”，她同样摆脱不了对男人的依赖。萧飒的不少作品，也写妇女婚恋的失败，如《禅》里的清丽借钱支持恋人出国留学，恋人到美国后却娶了他的“学妹”，清丽希望幻灭。《日光夜景》中的女副导演因忙于事业，自己的婚姻却触了礁。萧飒这类作品中的女性，大多是怨女怨妇，是生活的弱者，套用金融界的一个名词：她们都是“弱势货币”。蒋晓云也以妇女婚恋为题材，稍有不同的是她有较多的价值参照。社会的商业化，传统价值的动摇和道德观念的蜕变，使许多人失去了对未来的向往，失去了对社会的关怀和对他人的责任感，而贪婪地追求今日有酒今日醉的生活。这种现象也渗透进了年轻人的婚恋中，许多年轻人成了“无情的世代”。蒋晓云为这“无情的世代”画像。如《闲梦》中的范伦婷和洪伟颂，恋爱了七、八年，可是在洪出国时，他们彼此吝啬得连一句承诺的话都不肯给。在各人都困难的时候，也彼此远离着。洪伟颂觉得连自己都没有把握，拿什么向她保证？范伦婷想拣一份现成的，因为这个社会太现实了。胼手胝足找个伴来创事业，对男人是压力，对女人日后是威胁。洪不过是个留学生，怎能跟他受苦……在这里，蒋晓云撩起了爱情温情的面纱，揭出了它的俗相。与她们略有不同，曾心仪更多地将女性置于社会的律动中来探索妇女的命运。如《彩凤的心愿》、《朱丽特别的一夜》、《一个十九岁少女的故事》等等，她们为生存拼搏，无奈地承受凌辱，她们的不幸更具社会性。

女作家写的以女性生活为题材，探索妇女命运的小说，都是女性小说，但不一定是女性意识或女性主义的小说，两者是不同的。所谓女性意识应当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也就是女性主体的感知意识，女性的权利意识和女性的开拓创造意识。所谓新女性主义，也即是将这三种意识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台湾社会的发展，给妇女带来了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社会为妇女提供

更多的参与和就业的机会，使她们能够一展才华，成功的可能和竞争的胜利，使得不少妇女产生了事业追求的欲望，甚至获得了成就感。她们是成功者。另一方面，由于大量女性参与工商业，原来除妻子之外只能在色情场合接触女性的男子，现在与女性接触的空间空前地扩大了。男性争得胜利需要援手，失败后需要抚慰，以及职业女性魅力多方面的呈现所构成的巨大诱惑，使得那种没有或没有想到要投入竞争中去的贤内助、厨房天使、贤妻良母型的女性的价值跌落，她们或者遭到丈夫的冷落，或者婚姻破裂，沦为失婚女子。她们是失败者。失败者的苦涩和成功者的甜美的合力，催生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当然，由于竞争机制的作用，使得一些不具备竞争力的女性沦落到社会的底层，以至于用色相去换取生活。台北的一位张姓女郎，原来在百货公司就职，后来转入色情业。问她为什么要干这一行，她说：“像我这样国中毕业的，书没有念好，还能做什么？做什么会比现在赚得多？”对这部分尚未达到物质生活无虞的女性来说，女性意识或女性主义的呼唤，恐怕也不会没有要求的，即使潜在的要求，也总是一种要求吧。

从台湾这时期的女性小说看，也许曾心仪的小说中女性意识已经有所表现，但最明显表现出女性意识的作品，可能是袁琼琼的《自己的天空》吧。这篇小说写的是女主人公静敏从失败的婚姻中站起来的故事。静敏跟良三结婚后，把良三当作了自己全部。良三有了外遇，要与她分居，她连一丝的反击能力都没有。她想也许该像电视上表演的那样，“该一下子晕死过去，可是她光是健康的不痛不痒地坐着”，因为流泪，脸变了样，她觉得惭愧，“要分手的时候，让他看到自己这样丑”，当她想到自己是被遗弃的女人时，觉得“早几年的话她还年轻”，但并不清楚这年轻有什么好处。她想出走，可结婚后没有单独出过门……。她反观良三，在婚变临头时，他仍然是以“上对下的口气说

话”，“一点也不惭愧”，“一切安排得好好的”。是“自己无能”，静敏自责着与良三离了婚，经过几年的历练，成了保险公司的外务主任。她懂得修饰，心思细密，善于窥视别人的想法和感情波澜，在耐心的追求中，猎捕了一家贸易公司经理，成了一个自信、自主而有把握的人。小说相当充分地表现了女性主体感知和自我肯定、自我寻找人生道路的意识。

在谈到女性主体感知这个问题时，我们当然不会忘记李昂，不会忘记轰动一时的《杀夫》。《杀夫》从女性的性感知的角度出发，揭示自封建社会至今的、女性不能自主的、买卖婚姻的实质，即是男性对女性的性虐待和性摧残。作品以杀夫分尸来回应当男权或者说大男子主义的压迫，表现了女性对男性忧伤深广的愤怒，以及要求将性爱建立在自由的男女平等的基础上，在这一点上显示了它的女性意识，显示了它的新颖独到，并且将之与以男性的视角来描写婚姻自由妇女解放的作品区别开来了。但它的真正深刻之处，则在于透过不自愿、不平等的性关系导致的对人性的扭曲的描写，揭示男权主义所带给男女双方的不幸。李昂的女性意识，还表现在她对女性性要求只能是接受的、被动的，而不能主动追求这种传统观念的挑战，而给予女性正当的自然的性生活要求以公开的支持，这在《暗夜》等作品中有着明显的表现。

但是，把女性意识发挥高扬到女性主义程度的，是吕秀莲的出现。吕秀莲是新女性主义的倡导者，曾著有《新女性主义》、《新女性何去何从》等著作。1985年以来先后发表短篇小说《贞节牌坊》和中篇小说《这三个女人》。《贞节牌坊》写舞厅伴舞蓝玉青冲破封建的门第观念和资本主义的功利主义，拒绝接受受到众多名媛佳丽垂涎的“菲华企业董事长夫人”的头衔，而与一直深爱着她的医生叶明结合。藉着这个故事，作品对新女性主义的内涵作了三个方面的阐述：第一，在钱势面前保持女性的尊

严。蓝玉青拒绝董事长的追求，因为她要做真正的情人，而不愿做资本家燕尾服上的领结。她要告诉人们：“世界上总有一些东西不是钱势所能奈何的”。第二，只有两性相互扶持和真诚相爱，才会有积极和谐的两性关系。蓝玉青爱叶明，因为叶明自尊、自信和知情重情，不仅在火灾中营救她，还能以宽厚的胸怀对待她，给予温暖的理解和扶持，这里包含着对男性的期许。第三，在蓝玉青与叶明互以贞节的期许中，小说对贞操观念进行了新的诠释，这是最具创意的。小说提出：“贞操不是某种生理的表征，而是心里忠贞。”贞节是男女互负忠贞的义务。“片面要求女人守贞，而放纵男人所欲为，这是男性的自我堕落”。“贞操应该从礼教的桎梏提升为人性的修炼，从被动的束缚转换成主动的操守”，“贞节不以两性为限，贞节是对自己尊严的维护与对生活原则的坚持”。在《这三个女人中》，吕秀莲通过对高秀如、许玉芝、汪云三个女性形象的塑造，对女性主义作了进一步发挥。高秀如是她塑造的新女性主义的理想典型。她是有高学历的教授、系主任。她努力于事业的追寻，富有生活情趣，也渴望得到自认为真诚而境界相当的爱情，但她自尊自爱，宁可独处，也不降格以求。泰戈尔的“小草寻找地上的伴侣，高树满足天空的孤单”是她的座右铭。她坚持“女性在求取平等地位前她首先要学会自爱与爱人”。她是一颗新星，如作者赞美的：“这样的女子，已立而立人，于小我之外，另有大我的生命，即使在夜晚，也难掩其星斗般的光华”。许玉芝，从知识层次说，也是优秀分子，但结婚后变成了丈夫的一部分，即所谓的“依赖人口”，但在高秀如的影响下，她终于觉悟结婚的公式不是 $1+1=1$ ，而是 $1+1=2$ 。她要找回那属于妻子的“1”，从而怀着学生时代的豪情重建自我。汪云是天生丽质的美人。在当上董事长夫人后，一直确信没有人比她“更懂得美，更爱美！”确信她是最爱丈夫的，但是在丈夫闹离婚而死于车祸后，她才发现丈夫“外

遇”的原来是面孔丑陋心地善良的服装设计师林欣婉。她痛恨林欣婉，要杀林欣婉。但当她知道解救过丈夫危难的是林欣婉，悄悄帮助她走上自立道路的也是林欣婉，林欣婉爱她的丈夫不比她自己爱得少时，她终于自责并谅解了丈夫和林欣婉，并真心诚意地去救治她丈夫跟林欣婉生的孩子。她摆脱了传统女性观念的羁绊，成为自爱而爱人的新女性。

在新女性的形象里，还有廖辉英《盲点》中的丁素素，朱秀娟《女强人》中的林欣华。丁素素争脱封建家庭羁绊后又受到了事业合伙者的耍弄，但她却能从感情的困境中拔出身来，走上了自立、自强之路，成了获得人格尊严的新女性。林欣华原是高考落榜的高中生，但她不自轻自贱，不以色相去攀龙附凤，而是从一个打字员踏踏实实地拼搏磨练，终于成了“震洋”贸易公司总经理而驰骋商界。她在克服事业上和情感上的种种陷阱和纷扰中，形成了独特的处人、处事和处世、律己的原则，成了新女性中的英雄。

众多的新女性形象的出现，标志着台湾妇女觉醒的潮流正在涌起。从这里人们看到了希望之光。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在资本主义竞争机制下，成功者总是少数，英雄更是少数中的少数，多数人总不免要尝到失败的苦涩，所以妇女解放的道路仍然充满着曲折和坎坷。

四

70年代以来，经历了一系列政治震荡以后，台湾社会由于国民党统治的日益削弱，政治领域中的斗争日趋复杂化，这种斗争或若隐若现地，或极其鲜明地反映到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中来，出现了以政治生活、政治问题和政治斗争为题材的所谓“政治小说”。这些小说，有的是对殖民与反殖民斗争的历史的